

臺灣糖業鉅子 陳北學

李佩蓁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臺灣於同治元年（1862）開港後，在淡水、雞籠、臺南府城、打狗等通商口岸，與外商合作進出口貿易的買辦商人遂漸成為地方市場的中堅份子，如打狗的陳福謙即為當時執臺灣砂糖貿易之牛耳的買辦商人。在中法戰爭之際，為籌措臺地糧餉，給事中萬培因上奏提議清政府應積極向臺灣巨商勸捐軍餉，他在奏摺中特別指出：

臣查臺北紳士林維源，家資數千萬，雖經兩次捐出鉅款，際此軍務危急，責以再行倡捐，保固桑梓，實亦義無可辭。其次則臺灣府屬商人陳邦記係鳳山縣人，張怡記係泉州府人，資產在臺不下數百萬……擬請飭下劉銘傳，遴委妥員，馳赴各縣，按名指款，嚴諭捐輸，毋得藉端勒索；該紳商等亦不得飾詞延宕，致誤軍務。（註1）

也就是說，當時臺灣首富首推林維源，而其次就是號稱有數百萬資產的陳邦記和張怡記。陳邦記就是指打狗的陳福謙家，時任德記洋行（Tait & Co.）買辦；張怡記則是打狗的張仰清家，為怡記洋行（Elles & Co.）買辦。由此可知，此類清末買辦商人的資本累積，實不容小覷。

陳福謙（又名滿，1834-1882）是打狗苓雅寮人，祖籍福建省漳州府同安縣集美，有日翔（藻耀）、文遠（日新）、筱竹、日華、日瑄共五子，（註2）其弟名陳北學（又

名悅周，1840-1908）。此一家族的商業活動與開港後南臺灣的砂糖產業息息相關，在清末臺灣經濟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已有學者做了相關研究。但早先的研究者多認為陳福謙過世後，其諸子之經營手腕不如陳中和，導致家族的糖業版圖漸為陳中和接收。事實上，陳福謙死後，家族產業半由其弟陳北學承坐，他後來在砂糖貿易的經營成果並不遜於陳福謙。光緒 21 年（1895），臺灣政權交替之際，陳北學為避戰禍，舉家離臺赴廈，據說當時攜走的財產就多達六十餘萬。（註3）明治 33 年（1900），陳北學又遷返臺灣，且因其財力而受到殖民政府相當程度的重視。（註4）總之，討論打狗陳福謙家族的興衰，不能僅由福謙一房觀之，也必須注意陳北學的商業活動及其擴展。

陳福謙和陳北學這對兄弟的性格，在後人的記述中呈現相當反差的形象，福謙是「好善，多義舉。行旅之道其鄉者，解衣推食，濟其窮乏。故終歲無盜賊之警，亦無爭鬥之患，遠近感其德」；（註5）而北學卻是「鄙吝成性，視叔侄如仇人」。（註6）而縱然個性相異，在經營才幹上，兄弟則各有千秋，以下略述兩人的商業發展狀況。

陳家兄弟少時家貧，福謙乃以撐船為業，稍有本金之後，開始從事米、糖生意，於臺南府城開設「邦記號」。出身於打狗小漁村，而後竟能在府城設行營業，且邦記號在同治元年已成為臺南三郊的輪值大籤郊商之一，（註7）可見陳福謙的商務經營相當

成功。開港後，陳福謙敏銳掌握時機，迅速與外商建立合作關係，他擔任英商德記洋行的買辦，負責銷售進口的鴉片並採購臺灣南部的砂糖交付洋行外銷。並於旗後自設「順和行」，又在東港、阿里港和鹽水港等蔗糖生產地設糖棧，和當地糖商以預付款的方式建立穩定的供貨網絡，在全盛時期號稱掌握臺灣南部砂糖出口量的 1/2 強。（註8）除了洋行方面的業務，順和行也開拓日本砂糖市場，雇用西式帆船運糖至日本，在橫濱、長崎、神戶設分棧銷售，連雅堂便提到「臺糖之直配日本自福謙始」。（註9）而在米糖之外，陳福謙亦兼營布疋、雜糧等貨，可以看出他多角化經營策略，在南臺灣撐起一片商業王國。然而陳福謙甚為早逝，享年僅 49 歲。

至於陳北學原先並無參與其兄的事業，《臺灣日日新報》說他早年便「創業在外」，（註10）這極可能是指他在臺南府城內宮後街經營布店「新瑞和號」，（註11）據相關碑文可知此店鋪最晚在光緒 2 年（1876）即設立。（註12）陳北學早年重要的活動，是在光緒 10 年（1884）擔任府城的釐金包商。臺灣於咸豐 11 年（1861）始徵收釐金，光緒 6 年（1880）改為招商包辦，光緒 10 年時，陳北學與人合夥以六八銀 23 萬元包辦臺南的鴉片釐金，另須交臺灣道劉璈私費 2 萬銀元。（註13）當時進口鴉片一箱需納釐金約 117 元，而該年南部進口鴉片共 2,239.5 箱，可收釐金 262,021.5 元，扣除需上繳的

費用，陳北學等即可獲益一萬兩千多元，且釐金包商常又藉詞向商人額外索費，故實際進帳定然更豐。陳北學等人原欲繼續包辦釐金，然因劉銘傳以劉璈在中法戰爭期間隱匿釐金未報為由彈劾之，也因而撤銷陳北學等人的釐金包商資格。總之，由陳北學擔任釐金包商此事略可窺知他握有相當豐厚的資金。

對陳北學來說，光緒 13 年（1887）是最重要的轉捩點，因其家族於該年分家，陳家兩房由此析分家產，而陳北學藉此取得陳福謙的大半遺產，根據圖書記載，其所得產業如下：

上二房叔名悅周，圖分號榮萼，拈得本郡西門外邦記，及所開分棧本邑順源號，兼辦旂后得〔德〕記洋行辦行，東港順懋，阿里港順源棧等號，估銀叁萬元，找現銀壹萬，合共銀肆萬。（註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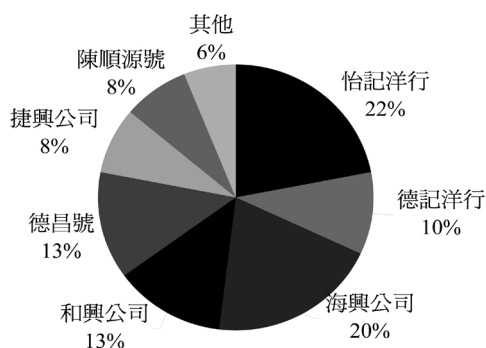
再參酌日後相關記載得知，部分產業是陳北學備出現銀承坐而得。然而，此次分家有所爭議，埋下日後陳北學與陳福謙諸子訴訟爭產的導火線。無論如何，陳北學確實在分家時取得府城的邦記行，及位於打狗的順源號、東港順懋、阿里港順源等分棧。值得注意的是，邦記行和順源號還兼作德記洋行的買辦行，這也代表德記洋行的買辦職務自此由陳北學接手。由於接收這些糖行及分棧，陳北學開始涉入砂糖貿易的活動。

陳北學在分家後的第一件大宗投資，就是於光緒 13 年參與成立和興公司，從事臺海兩岸、日本和香港之間的貿易，主要商品仍是砂糖。和興公司的資本合計十一股，陳福謙的三個兒子日翔、文遠和筱竹持有四股，陳北學佔兩股，另陳氏族親陳和信、陳和智各有兩股，加上陳中和一股，由陳中和擔任和興公司的正當事。（註15）如此，陳家雖然分爨，其資產仍以和興公司作一整合。和興公司因由陳中和負責經營，故時人與後來的研究者多著重陳中和在該公司的角色。不過，陳北學對於該公司的影響力也不可忽視。例如和興公司在明治 38 年（1905）經營失利，向臺灣銀行和三十四銀行的貸款 50 萬圓未獲展延，各股東又不肯分攤虧損額，一時之間公司幾乎瓦解，明治 39 年（1906），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局長祝辰已就親自南下，央請陳北學出任和興管理人，才穩住公司狀況。（註16）

至於陳北學其他的生意，還有臺南的邦記號兼作德記買辦行（以下簡稱德記行），負責安平口岸的商務，順源號負責打狗口岸。不過這兩處行號並非由陳北學親自經營，而是聘用當事來經理。順源號的當事為陳升冠，（註17）德記行則由方慶佐擔任正當事，蔡長雲任副當事。到了光緒 17 年（1891），方、蔡兩人也入股德記行，和陳北學成為合夥人的關係，出資額為陳北學 8 萬、方慶佐 1 萬 5 千元、蔡長雲 5 千元。（註18）日治初期，陳北學雖暫居廈門，但因各

行號有專人司理，仍持續營運。

據明治 32 年（1899）臺灣銀行的調查發現，當時臺灣砂糖輸出日本的佔有比率如下圖：（註 19）



根據調查，當時德記雖有「洋行」之名，實際上不論是資金或是營運，都已由買辦主導。而陳北學握有德記行和陳順源號，再加上其為和興公司的重要股東，因此，說他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糖商也不為過。當然，德昌號王雪農、和興公司陳中和也都是每年可掌握百萬斤以上輸出量的糖商，但從日治初期幾次調查來看，他們的實力並未超越陳北學。只是因陳北學滯留廈門，故相關調查都是以方慶佐和陳升冠為名登記，但由前述的店舖所有權和資金關係就知道，方慶佐和陳升冠的後台老闆其實是陳北學。

陳北學在 1895 ～ 1900 年間，旅居廈門鼓浪嶼，以經營錢莊為業，臺灣的產業則分別由陳文遠（福謙次子）、陳中和、陳升冠和方慶佐打理。同時他還擔任廈門東亞書院

的董事，在當地得到相當的名望。不過，他在廈門的事業經營並不順遂，由於當時中國經濟蕭條，導致錢莊遭倒欠甚多。最終，陳北學於明治 33 年返臺定居，並提出入籍臺灣的申請。他是眾所矚目的「百萬富翁」，故其入籍臺灣的舉動特別引起兩岸官民注意。時人揣測，他可能是因多樁官司纏身，故想取得日本國籍以獲得身分上的優勢。據了解，當時的陳北學正與廈門生和泰號、福州陳有行爭訟，且又與臺南新瑞和號的前店夥侯鏡清隔海纏訟多年未果。（註 20）但最大的問題應該還是他在臺灣的產權發生變數。

前述提及陳家在光緒 13 年的分家存有爭議，由於陳北學申請入籍臺灣，故臺灣總督府委請日本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對陳北學身家狀況作了詳細調查。根據上野的報告指出，陳北學的家產多來自於橫奪其兄產業，並因而與侄兒陳日翔（福謙長子）交惡。（註 2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也記載了這件公案，提到陳北學當時賄賂某孝廉主持分配家產，導致陳福謙「所有生理以及在外基業半歸私有」。而價值七、八萬的邦記行，原本應由陳日翔繼承，北學竟僅出三萬元承坐之，「其侄年幼無知，無從計較」。（註 22）不過照陳北學後來的說法，他其實只以銀一萬五千元就取得邦記號。（註 23）

陳北學在 1895 年離臺之時，將他持有的臺南邦記行和打狗順源號之契券存置於陳文遠處。結果陳文遠就在北學滯居廈門期

間，利用臺灣總督府進行土地調查的時機，將這兩筆產業申告為順和行所有（當時順和行的負責人就是陳文遠）。（註24）陳文遠極可能是不滿分家時的不公，企圖奪回原屬於陳福謙的產業，而這也逼使陳北學回臺處理產權糾紛。陳北學此後仍常往來臺廈兩地處理商務，一直到明治41年（1908）2月13日逝於香港為止，他的晚年幾乎是在接連不斷的財產糾紛中渡過。

陳北學回臺後首先處理土地產權問題。他以光緒13年所立的鬮書、順和租館帳簿及和興公司帳簿為證據，向臨時土地調查局提出異議申告，主張自己確實已在分家時備出款項買下上述產業。同時，也央請族親鄉老出面調解，以求平息爭端。但在明治36年（1903）4月的親族大會上，雖連福謙長子陳日翔都返臺出面協調，但陳文遠藉故而未出席該次會議，調解之舉不了了之。結果明治36年8月，臺南土地調查局認為陳北學提出的帳冊證物有造假嫌疑，故仍認定陳文遠為此紛爭地的業主。（註25）陳北學不服，又續向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提出申訴，直到明治37年（1904）11月，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方裁定陳北學為業主，（註26）歷經數年的產權糾紛才告一段落。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家產土地紛爭尚未平息之際，臺南的德記行又發生變故。此行號向來經營得宜，在日治初期號稱有資本75萬圓以上，而同一時期的大商號如和興公司陳中和、德昌號王雪農的資金

各約20萬左右，相較之下，德記行的實力不同凡響。但說來則須歸功於該行當事方慶佐經營得法，副當事蔡長雲亦功不可沒，兩人既入股該行，又身兼經營管理之責，一向盡心盡力，使該行年年獲利。惟陳北學離臺時，此一行號的店主便登記為方慶佐，而其在明治37年病逝於廈門後，一切財產包括德記行遂由子方振基繼承。然而，當時方振基年僅廿三、四歲，陳北學考慮其不足以勝任店主之職，在明治38年2月宣布由蔡長雲升任店主，另聘曾擔任三井公司買辦的葉三舍為副店主。方振基見行內人事改易，而自己竟無能聞問，心生不滿；加上其母欲向行內借用一千圓赴中國探親，卻遭蔡長雲拒絕，雙方關係更急轉直下。為了捍衛自己權益，方振基在8月中，委託律師往臺南地方法院申告自己是德記行的店主，並公開於《臺南新報》刊登啟事，宣布解雇蔡長雲和葉三舍。（註27）

此一變故突起，陳北學氣憤難當，直斥方振基「不知感恩，反以營業係亡父之名，自操勝算，妄爭業產，謀為爭訟不已，繼以爭奪」，而蔡長雲一方也不得不委請律師循法律途徑處理。此時，雙方的友人，在臺南經營貨運、雜貨的秋山善一出面協助調停。嗣後，兩造於雙方律師的見證下，在該年十月底對德記行的股份和經營權達成協議。首先，於目前的資金中抽出給方慶佐和蔡長雲的「賞功銀」後，其餘部分重新分配，確認陳北學得16股，方家3股，蔡家1股。其次，

賦予方家和蔡家花紅抽分的利權。最後，將德記行內改設為計算部、討賬部、暫設營業部，將會計、出納、業務等職責做一區別；而每部又各置主管和副主管，互相監督。（註28）重整內部組織對於德記行而言別具重要性，原先按照傳統合股經營的商號經改組後，某種程度上使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向近代化的公司制度轉型。

此次紛爭雖然暫時於調解後平息，然而因店主之名仍為方振基，以致於陳北學過世後，其子又續與方振基爭訟。

陳北學並無親生子嗣，僅有養子（螟蛉子）陳日章、陳萼棣、陳溫溫，但陳日章和陳溫溫主要住在廈門。過去稱「富有百萬」的陳北學，在晚年由於官司纏身，特別又因為和興公司問題導致若干虧損，但其遺產仍佔有八十餘萬，除田園房屋等不動產外，還有安平一片魚塢、匯豐銀行股票、香港仁安保險公司股票，以及尚未收回的債項等。

（註29）由於遺產龐大，且家族內部又意見分歧，後來由臺南廳介入其遺產處理。股票的部分全部折現，由其妾王淑真和三子按比例分配，（註30）在臺灣的不動產主要由王淑真和陳萼棣繼承（《臺灣日日新報》提到陳萼棣是王淑真與前夫所生之子）。陳萼棣因德記行問題而與方振基互控，然而，德記行最終因和興公司的債務問題而在明治42年（1909）遭銀行查封拍賣。（註31）陳萼棣自己另開懋德行，也在廈門擔任日商買辦。（註32）他與父親行事不同，待人謙恭、

樂善好施，如陳北學出殯時，適逢中元普度，陳萼棣不但捐大筆款項助普，（註33）又舉行施捨，凡鰥寡清寒殘疾者，給領白米三升，清錢四十，相當受人稱道。（註34）但在商業經營才幹上，則遠不及其父，且自繼承遺產後，過於揮霍奢侈，因而無力維持龐大家業，使其父的豐功偉業漸埋沒於歷史洪流中，少為人知。而綜觀陳北學的經商模式，也可發現他較少親自經營，多以資本投入和聘用專業經理人的方式進行，或許因此容易使人忽略其在糖業貿易上的重要性。

過去我們大多以為臺灣開港後，本地商人不敵外商勢力入侵。但陳福謙、北學兄弟的發展歷程，讓我們看到臺灣商人家族如何肆應開港後鉅變的商業環境，甚至在重要的砂糖貿易中取得主導權，進而累積可觀財富。未來臺灣商業史的研究，應該繼續發掘這一群買辦商人的事蹟，相信能引起更多面向的討論。

【註釋】

1. 邵循正等編，《中法戰爭（五）》（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599。
2. 楊玉姿，〈清代打狗陳福謙家族的發展〉，《高市文獻》1:2（1988），頁1-19。
3. 〈陳北學遺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5月16日，4版。
4. 〈臺南縣陳北學外五名戶籍編入認可、臺南縣陳北學ノ性行宜シカラサル旨廈門領事ヨリ申來ル〉，臺灣總督府檔案，628-14，戶籍人事門戶籍類，1901年3月19日。
5. 連橫，《臺灣通史》（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6），卷35，頁1010。

6. 同註 3。
7.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臺北市：南天書局，1983；1910 原刊），第三卷上，頁 53-54。
8. W. W. Myers，林滿紅譯，〈清末南部臺灣的蔗糖業〉，《臺灣文獻》28:2（1977），頁 137-142。
9. 同註 5。
10. 同註 3。
11. 〈台民侯鏡清控廈門陳悅周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館藏號：01-16-086-06。
12. 〈重興開基武廟碑記（光緒二年）〉，《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市：臺灣銀行，1966），頁 718-719。
13. 〈嚴劾劉璈摺〉，《劉壯肅公奏議》（臺北市：臺灣銀行，1958），卷 10，頁 430。
14. 〈鳳山廳大竹里苓雅寮庄申立人陳北學ヨリ臺南廳臺南市街辛建物敷地二百番其他土地ノ業主權ニ付キ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ニ於テ裁決ノ件〉，臺灣總督府檔案，1010-60，土地家屋門雜類，1904 年 11 月 17 日。
15. 〈和興公司清算人選定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檔案，5400-11，財務門金融類，1911 年 7 月 1 日。
16. 〈銀行對糖商問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6 月 10 日，3 版。
17. 〈三十年九月現在糖業者取調表（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檔案，9787-25，稅務門賦稅部糖業稅及樟腦稅類，1897 年 10 月 1 日；《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 538。
18. 〈臺南德記洋行之紛紜〉，《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8 月 25 日，5 版；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三卷上，頁 118-120。
19. 川北幸壽，《臺灣金融事情視察復命書》（臺北：臺灣銀行，1902），頁 137-140。
20. 同註 4。
21. 同註 4。
22. 同註 3。
23. 〈鳳山廳大竹里陳文遠外一人對陳北學調查書〉，臺灣總督府檔案，4420-35，調查門調查類，1903 年 8 月 1 日。
24. 〈鳳山廳興隆內里陳文遠對陳北學和解ノ件〉，臺灣總督府檔案，4427-2，調查門調查類，1904 年 1 月 1 日。
25. 同註 23。
26. 同註 14。
27. 〈臺南德記洋行之紛紜〉，《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8 月 25 日，5 版。
28.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三卷上，頁 118-120。
29. 〈陳北學遺產分配ノ件〉，臺灣總督府檔案，2491-7，外事門雜類，1916 年 10 月 1 日。
30.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民政局，1926），卷 21，頁 73-74。
31. 〈受累奚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1 月 26 日，5 版。
32. 〈殖民買辦〉，《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5 月 6 日，4 版。
33. 〈孟蘭大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7 月 21 日，4 版。
34. 〈施捨財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7 月 22 日，4 版。